



第 29 期（总 29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 目 录

### ■ 新闻动态

继续教育学院 2015 年全员理论学习暨学院信息宣传业务能力专题培训会	4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2015 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	5
中华文化复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	8
【通识教育】李猛：经典阅读与现代生活	10
泛舟时间洪流·感受青春传承——张亚光做客第七期“新青年·享阅读”	13
中华美学基础工程书系出版座谈会举行	15
北大口腔医院连续六年获“中国医院最佳专科排行榜”口腔医学专科第一名	17
人民医院黎晓新教授在美国眼科学会 2015 年会作主题发言	18
日本大分大学访问团到人民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交流访问	19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一行来访	20

### ■ 北大人物

五大在线教育领域现状与先机	22
教育部推出“公益+艺术+教育+网络”美育新模式	29

### ■ 学者谈读书

李爱国：冰雪相融 笔墨传情	30
濮祖荫：祖法先哲 荫及后学	33

## ■ 好文共赏

杨绛：读书苦乐 ----- 46

专访北大社会学张静教授（下） ----- 48

## ■ 史苑钩沉

陈平原：战火烽烟催不垮的中国大学 ----- 55

## ■ 大美北大

燕园 雪晴 ----- 60

## ■ 学员心声

读书是福——参加北大军转培训第一周体会 ----- 63

## ■ 编辑寄语

2015年还剩下最后一个月，北方大雪，南方也降温了。临近期末，请同学们好好复习，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预祝大家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

这一期燕园网讯，带来燕园雪中消息。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峰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鹁、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 新闻动态

### 继续教育学院 2015 年全员理论学习 暨学院信息宣传业务能力专题培训会

2015 年 11 月 20 日下午，继续教育学院第三次全员理论学习暨学院信息宣传业务能力专题培训会在燕园大厦 1218 室举行，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李胜主持会议，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党总支副书记杨虎以“浅谈实务工作中的文章写作”为题进行了主题讲座。学院信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信息宣传员及学院各部门员工参加了本次活动。

杨虎首先对《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进行了解读，并以史实为引与在座同事分析了写好文章的必要性。杨虎表示写好文章是“经国之大业”，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是个人的“进德修业”，也是提高工作能力的必然要求。

随后，杨虎围绕义理、考据、词章、格局、经济几大关键要素，就如何写好文章展开了深入分析。讲座过程中，杨虎理论结合实际，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为与会人员带来了一堂务实而生动的讲座。



本次理论学习培训会是本年度学院出台《继续教育学院关于学院员工学习安排事宜的补充规定》后，在全院层面开展的第三次集中学习，也是《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信息宣传工作管理办法》推行以来开展的首次专题培训。本次活动是学院在进一步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和推进信息宣传工作方面的又一次有益探索，对助力提升基层信息员写作能力、提高学院信息宣传工作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来源：北大继续教育学院

编辑：丁香的花朵



##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2015 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

11 月 14 日，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 2015 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高教司副司长张爱龙，以及来自全国的近 200 名高校代表出席会议。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出席会议并致辞，联盟理事长、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作联盟工作报告。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成立于 2013 年 4 月，由林建华（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现任北京大学校长）倡议发起，首批共有 29 所 985 及 211 高校加盟，旨在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和运行模式，率先将优质课程资源在东西部高校之间实现共享和学分互认，并以此带动跨校跨地域的教学团队建设，从而让每位学生都有机会享有国内最好的课程，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利。



林建华致辞

林建华在致辞中首先回顾了当年在重庆大学推动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建设的初衷。西部学校很希望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东部学校提供优质资源的动力何在？他认为一方面是提升东部学校在教学、人才培养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东部学校可以通过建设这些翻转课堂资源，提升自身的教育质量。而老师的动力是显而易见的：将来的名师需要有好的慕课。林建华指出，现代信息技术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为师生提供了远程互动的可能，但要解决西部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需要提供经过严格管理后能够认定学分的课程。如果只是提供上网看的视频，就和过去电视大学的课程没什么两样了，因此必须提供互动的课程，这正是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与 edX、Coursera 以及国内其它平台最大的区别。

高松在会议上公布了一组数据，经过两年半的发展，联盟成员已经增加到 93 家，包括近 30 所 985 高校和近 70 所 211 高校，这些学校在联盟运营商智慧树网所提供的专业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累计开设了联盟委托运营课程近 200

门，全国受益学校超过 1000 所，覆盖大学生人群 1000 万，已有近 50 万学生通过联盟课程获得了学分，累计有超过 100 万大学生修读了学分课程。这些课程被称为“中国式慕课”的典范。慕课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线上为碎片化知识点视频，使大学生能灵活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线下跨校直播互动和小班讨论学习，使大学生可以把线上学习的问题带到教室，与同学、老师讨论。高松在联盟运行大数据报告中指出，在 2015 年秋冬学期，联盟共组织了 8482 个教学班，参加跨校直播互动的班级次数超过了 1 万次。学习人数从 2013 年秋冬学期的 3615 人上升到 2015 年春夏学期的 32 万余人，实现了百倍增长，学生总体满意度与合格率长期保持在 90% 以上。从大数据看到，这些跨校共享课程解决了学校课程多样化的问题，但如何提供好教学条件、组织好教学运行，以保证教学质量，这是学校管理者所面临的新的教育资源管理的分配机制改革。

“中国式慕课”能够取得飞速发展，学分课程质量被各校广泛认可的原因在于机制的创新。在 2015 年秋冬学期上线的“艺术与审美”课程就是这一创新机制的产物。课程由教育部体卫艺司委托，

由北京大学和智慧树网共同建设，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叶朗担任总策划，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美院等 8 所高校的 20 位著名学者担任主讲。“政府积极引导，一流大学、大师深度参与，社会化企业服务支持”的模式，就是整合创新机制。“军事理论”课程同样如此，创造了运行 3 学期、累计 40 万学生修读并获得学分的纪录，在 2015 年秋冬学期，更创造了 20 万人同上一堂课的纪录。“人文与医学”课程由复旦大学医学院闻玉梅院士领衔，邀请多位院士积极参与到教学第一线，被称为名副其实的“院士大课堂”。“食品安全”课程是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科普宣教办公室委托，浙大、北大、复旦等 13 所大学共建，20 多位食品安全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创新、教学。我国教育优质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差异明显，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及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整合创新机制就是依托市场化服务，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以服务的力量帮助学校协作创新。

这样的高质量“中国式慕课”越来越受到各方认可。会议上，北大教授张海霞宣布将由她担任总策划，联合北京大学 7 个学院的 9 位学者以及校外专家，

与智慧树网共同建设全国第一门创新创业慕课课程——“创新工程实践”。张海霞具有创办 iCAN 创新创业大赛 10 年的实践经验。该课程旨在培养既有创新思维，又有创新实践能力的大学生。

林蕙青在总结讲话中代表教育部，向为此作出贡献的北京大学、各联盟成员学校的领导老师们，以及平台建设的运营单位——智慧树网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她指出，联盟中高水平大学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东西部高校优质资源共享、实现教育公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充分体现了这些高校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东西部高校直面挑战，支持和鼓励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新手段，参与和创造性地应用优质资源提升教学水平，在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智慧树网发挥了技术平台支持、课程建设服务、教学运营服务等重要的作用。经过两年的发展，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已经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的东部高校支援西部高校的概念，而且是东中西部高校之间共享优质资源、共同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教改之路，分享改革成果，是一个共建、共享、共赢的联盟。联盟的协作经验和取得的成果值得肯定，并且值得

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她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领导对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育目标，积极开展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着力推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她对联盟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期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改革深度融合是十三五期间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希望联盟和高校继续努力，积极组织协调、动员更多学校更多教师参与到这项富有时代意义的改革中来，研发出更多高品质的课程，引导和示范在线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

王登峰从分管的司局业务角度，谈到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所开设的“军事理论”“艺术与审美”课程是由专门机构组织全国最优质师资、下大功夫认真钻研建设的课程，充分体现了课程建设所要表达和传递的价值理念和内容，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他指出，包括体育类、卫生类课程，也将努力探索，用这种全新的方式既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同时也解决课程吸引力的问题，希望有更多专家参与、更多



的同学受益。最后，他代表教育部体卫艺司感谢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智慧树网和所有参与慕课建设的专家们。

会上，来自各成员学校的代表纷纷分享了他们的参与、实践经验与感受，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日益广泛的影响力、健康而快速

的发展，彰显了政府的有力支持、一流大学的责任担当以及市场化专业服务的全力保障所形成的合力，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安宁

## 中华文化复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5年11月12日上午，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和文化部·北京大学两岸文化研究基地承办的中华文化复兴论坛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前部长蔡武，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龙明彪，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汪毅夫，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等领导、嘉宾，以及海峡两岸思想界、文化艺术界、宗教界、教育界包括楼宇烈、陈鼓应、学诚法师、许世铨、李义虎、黄嘉树、杨毅周、黄光国、何怀宏、杨开煌等在内的2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主持。



龙明彪首先致辞，他代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向与会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本次论坛是在两岸关系发展翻开历史新页的重要时期举办的，围绕中华文化复兴、民族振兴这一主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对弘扬中华文化、提振民族精神十分有意义。11月7日，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面，这是两岸关系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次会面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先河，开辟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前景，夯实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必将载入史册。习近平提出两岸同胞应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耀；马英九倡议两岸应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为中华民族开创更加和平灿烂的未来。由此可见，致力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梦想和追求。本次论坛的举办正是恰逢其时、意在长远。中华民族具有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是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和共同财富。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建设共同精神家园，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责任。龙明彪希望论坛取得丰硕成果、作出积极贡献。

刘兆玄在致辞中回顾了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的历史，其前身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成立于1967年，在推动伦理道德、民主自由、科学技术三个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对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未来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是每一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文化在其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怎样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精髓与新世纪的重要思想和人类的迫切需求结合起来，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是中华文化复兴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华文化复兴设定的目标要考虑为全人类作贡献，建立新的普世价值。

朱善璐代表主办方北京大学对与会的领导嘉宾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他指出，中华文化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等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资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使命。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下，研讨和推进中华文化复兴与繁荣，是文化界、学术界专家学者的重要责任。北京大学举办此次中华文化复兴论坛的主旨就是发挥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在中华文化复兴进程中的作用，扮演中华文化复兴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共同为中国崛起提供文化和理论支持，引领两岸文化思潮发展方向，促进两岸“心灵契合”和价值理念统一，为两岸携手共同振兴中华、共圆中国梦创造更好的条件。朱善璐希望两岸更加重视文化交流和人心交流，特别是两岸青年之间的交流，使两岸同胞从

文化上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从而达到“心灵契合”。他希望本论坛能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为中华文化复兴作出贡献。

据悉，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华文化复兴与民族振兴”，在为期两天的交流研讨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中国梦的文化内涵”“中华文化复兴与两岸关系”等议题展开研讨。此外，本次论坛还特别邀请部分两岸青年学生参会并在会后进行文化考察，以促进两岸青年交流，让更

多的台湾青年了解大陆，了解中华文化发展的前景与动力，共同探讨中华文化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计。

中华文化复兴论坛的举办得到了文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台办及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等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并在海峡两岸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新闻网记者 张宁）

摄影：李香花

编辑：安宁

## 【通识教育】李猛：经典阅读与现代生活

“公民科学，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或是专业技术的‘主导技艺’。只有公民科学，才能使理性摆脱冷漠、热情避免亢奋，理论成为理论的生活。而最终，使大学成为真正独立和自主的‘普遍’和‘完整’，使其中的学生成为这种精神的化身，成为自由人和公民。”

十年前，北大哲学系李猛教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雄辩的文章——《大学的使命：公民科学与自由教育》。十年后，通识教育在中国高校中广受重

视，李猛也为北大学子带来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一——“古代西方政治思想课程”。

### 德性、智慧、视野

在《大学的使命：公民科学与自由教育》中，李猛写道：“大学的使命，在于自由教育，而自由教育的要害在于结合哲学、政治和伦理的公民科学。”专门的技艺和实证知识本身，并非大学的目的；相反，是大学的目的给了这些技艺和知识以方向和目标，“哲学让我们能够思考这种技艺的可能与限界，政

治让我们能够探索这种技艺成为现实所要求的审慎与权衡，而伦理则让我们培养践行这种技艺必需的德性和智慧”。

由李猛开设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一——“古代西方政治思想课程”，正响应了他对大学使命的设想。课程通过阅读古代文学、历史与哲学作品，结合当代学者的研究，去理解西方古代城邦世界的政治形态，思考作为西方政治思想源头的古典政治思想传统。李猛希望课程能够“启发同学们思考人的有限、政治中的力量与道德、人的欲望与德性等始终困扰人的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

李猛意识到，人文通识教育与理工科许多学科的专业研究没有直接联系，但他始终强调，经典阅读是为了给予学生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所需要的、超出其专业训练之外的教育。相较传统的、培养具有人文修养的君子的古老体制，当代大学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大学被整合到围绕科学技术建立的社会生产结构中，越来越受到政府和企业的议程设置左右。在这种环境下，阅读经典尤为重要。李猛坚信，阅读和思考能够让一个人沉积视野和修养，并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厚积薄发，产生出惊人的力量。“并不只有读书才是修行，而是

当你在大学读过书之后，你会知道自己对这些问题曾经有过这么深入的思考。是否只知道人生重要的是幸存和金钱，这个问题对于政治家和生意人都很重要。比如赚钱，理解金钱给人的自由、力量以及钱本身的虚妄、弱点，这是读书赋予一个人的洞察力。但这些最终都得在生活本身中完成。”



李猛老师（中）与学生交流

许多人文学者对大学的变化不太满意，但在李猛看来，当代人文学者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一个空间，做一些努力，提供对所有专业的学生都有意义的东西。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看，大学教育融汇了来自英国与德国的不同传统。哈佛等本科学院强调通识教育，而约翰·霍普金斯等现代研究型大学则比较重视精深的学术研究。这两个传统在美国的优秀大学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不一定会让学生在专业上有所提高，但可以使他生活得更好”，这是李猛希望经典阅读的通识教育能够达到的目标。

### 读书方法心得

“古代西方政治思想课程”每周一课，共设计了14节课程，为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李猛为学生们列出了10本左右的经典阅读参考书目。

对非专业、无基础的学生来说，阅读哲学书籍的过程如闯石城汤池，实为不易。对此，李猛认为，对一个作品真正的把握首先要集中在作品本身。不论是文学还是哲学作品，阅读都有一些共通之处。首先，应承认经典文本本身的中心地位，经典文本可以承受住反复的细读和质问，每次都可以激发读者的思考。好的文本可以激发读者的内在潜力，并随读者的成长而展现出新的深度。其次，应尊重文本的封闭性。一个可以细读的文本其本身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文本之外的东西可以作为理解文本的线索，但不具备决定性。

谈到具体的阅读技巧，李猛表示，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读书方法，但大体有一些方法是通用的。

第一，擅用读书笔记和札记。记笔记本身就是一个逼迫自己不断概括和提纲的过程，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回忆书中的内容，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对文本结构的把握。札记记录的是阅读过程中涌现的想法和感受。读书的“感觉”非常重要，人第一眼“抓”住的东西往往就是自己对文本最动人的地方的直觉。保留对一本书的原初感觉，有助于我们在若干年后，回到对这本书最初并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中去。

第二，加强写作训练。对于读书中发现的感兴趣的问题，可以拟一个写作提纲：如何开篇？如何推进研究？分几个步骤？李猛表示，写作提纲或许并不会变成文章，但从某个特定角度把整本书重读一遍，会带来新的收获。并且，带着创作的心态读书，才能更清晰地看出文本内容的良莠之处，分辨出作者故意模糊的部分。

第三，多与朋友交流。围绕文本的讨论并不是完全非个人性的，相反，对文本的理解能够反映一个人切身的生活体验，但同时又能够约束讨论，使交流不至于松散。和朋友一同读书，一起把一本书一点点读懂，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和朋友讨论能够激发出独自思考时不会出现的想法，也能够逼迫自己在争论中

不断打磨思维。同时，与不同背景的人讨论，需要把文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讲出来的能力，有助于把问题返回到最基本的地方。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 泛舟时间洪流·感受青春传承

### ——张亚光做客第七期“新青年·享阅读”

11月18日晚，由青年研究中心（网教办）与出版社、图书馆联合主办的第七期“新青年·享阅读”读书沙龙活动在图书馆举办，经济学院张亚光副教授应邀担纲本期读书沙龙“领读导师”。20余位不同专业的学生在张亚光的带领下，围绕蒋梦麟先生经典著作《西潮》，以其人生经历为引，回顾老北大时光，感受中国近代历史变迁。

读书沙龙分为导师领读、自由提问和互动讨论三个环节。在领读环节中，张亚光首先回顾了百年前的《新青年》及五四运动，向同学们展示了书中故事的大历史背景。随后，他将焦点转向蒋梦麟先生及《西潮》一书。张亚光认为，《西潮》“就是一本北大校史，而蒋梦麟先生和北大发展、和近代中国的历史紧紧连在一起”。他依据书中的三条线

索——作者的自传、北大的历史、近代中国的命运，与同学们分享书中的精彩片段，解读和剖析文本背后所透露的真切人物情感和沉重历史现实。最后，他还特地向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同学们推荐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和泰勒的《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这两本书。

在自由提问环节，同学们受张亚光的领读启发，积极向老师请教。有同学注意到蒋梦麟先生来自浙江的事实，向老师请教北大历任校长中有8位来自浙江的文化原因；有同学则着眼于蒋梦麟与北大的密切联系，向老师请教蒋梦麟曾说过的关于“蔡元培和胡适是北大的功臣，我们是北大的功狗”这一话的理解；有同学则由书中所言的“流民没工

作，为社会带来一定的隐患”，联系到当下，向老师请教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

互动讨论中，同学们继续开动脑筋，彼此交流各自的阅读心得和想法。大学生情怀、中国近代社会道路等话题成为同学们关注的焦点。关于大学生情怀的话题，有同学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每个时代的普遍存在问题；有同学论证不同时代青年人的不同选择主题；有同学则依据一些海外留学的例子进行分析。至于中国近代社会道路选择的问题，有同学对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异同进行阐述，有同学反思西方近代社会的道路选择，还有同学反思问题背后东西方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上存在不同选择的客观环境原因。同学们的发言，进一步引发了其他同学的思考与共鸣。

对话中，张亚光围绕《西潮》一书，与同学们谈道，北大学生应该延续先辈“余所望者，新鲜活泼之青年”的殷殷厚望；蒋梦麟先生“做学问要抓重点，舍弃细节，凭理智辨是非”的论述，对

于现在的学生“依旧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作为新青年网络文化工作室的重点线下活动，“新青年·享阅读”定位于小型高端的学术讨论，读书沙龙以守正创新的态度，坚持吸纳与整合“时空变化”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变革”的既定路径，致力于搭建“深度阅读”与“即时交流”相融合的读书平台，并努力追求在活动环节设置过程中，通过最大限度的主客体互动来实现教育引导的目的，以此搭建一个师生沟通交流的平台，在校园中努力营造自主阅读、自主思考、自主探讨的良好读书氛围。

（文/沈博、刘甦 图/沈博）



## 中华美学基础工程书系出版座谈会举行

2015年11月8日,中华美学基础工程书系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组织编纂,历时25年、200多位学者参与编写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美学通史》《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三套多卷本陆续出版完成。三套书共计25卷,近2000万字,是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在叶朗教授带领下,历时25年先后完成的。

此次座谈会围绕上述出版的三套多卷本著作内容,对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与途径进行了集中探讨。

叶朗在发言中回顾了系列图书漫长而又艰辛的出版历程。他指出,这三套美学书籍是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北京大学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要求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传统美学内容极为丰富,有许多富有民族自信的理论,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传承价值。继承中华传统美学遗产,对于我们当代美术学科建设和当代审美

教育、审美实践,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在人文学科建设和学科研究中重视资料建设、重视理论思维,这将有助于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叶朗致辞

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汤恒、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万丽君、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图书处处长杨芳等领导嘉宾在发言中对参与图书编写的各位学者表示感谢,对出版单位表示祝贺。他们从理论的角度对三套图书进行了评述,认为这三套图书是坚

持和培育文化自信的时代之作。图书极其全面的内容覆盖、科学的构架、深刻的内涵、丰富的典籍、详实的史料、精准的剖析、独到的见解，实现了在美学领域许多零的突破，填补了美学领域许多学术空白，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百科全书”，也是诠释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优秀教材。



研讨会现场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对三套美学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对参与编写工作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他指出，北京大学在美学研究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是现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发祥地，从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开始，就形成了美育教育和重视艺术教育的优良传统，美学在北大更是一个具有传统优势的学科。这三套书由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组织编著出版，是新世纪北京大学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

重大成果，体现了北京大学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北大，一批以叶朗教授为代表的美学学科研究人员，继承和发扬了北大美学教育的优良传统，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林建华讲话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井君、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阎志坚、江苏人民出版社总经理徐海、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郑可，原中国文联书记

处书记、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仲呈祥以及各参与编写院校的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文/姜南）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未天

## 北大口腔医院连续六年获“中国医院最佳专科排行榜”

### 口腔医学专科第一名

近日，复旦版“2014年度中国医院最佳专科排行榜”发布，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连续六年位居“最佳专科排行榜”口腔医学专科第一名。

本次发布的2014年度排行榜中，北大口腔医院除在口腔专科名列榜首之外，在包括众多综合医院在内的“最佳医院排行榜（综合）”榜单中也取得了第54名的好成绩，学科声誉得分11.495分（科研学术分6.64分+平均声誉分4.855分），展现了医院的整体实力。

该评选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组织，自2010年开始，每年推出上一年度的排行榜单，今年已是第六次发布。作为只制定规则、进行计票和执行工作，而不参与评审和投票的独立第三方，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借鉴了美国Best Hospital同行评议的方式，从专家库中抽取34个临床专科的3729名国内著名专家，由专家们综合考虑学科建设、临

床技术与医疗质量、科研水平等因素，对本专科领域内排名前十的医院进行提名和排序，然后根据专家的排名，得出该专科领域的各医院平均声誉，再排序产生最终榜单。在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的基础上，根据每所医院获得的各专科声誉排名，再辅以SCI论文影响因子总值、国家级获奖情况等要素得出该院科研学术水平得分，最终得出中国最佳医院的前百名排行。

据报道，本次评选在进入实质性评议时，是从已经确定的3729名专家库中，按照东、中、西三类地区随机抽取若干位专家作为信函调查或Email调查对象。特定专科中专家数量不满的，按收集专家数量列入调查对象范畴。

在计算特定医院的某个专科等级分SGP时，会用严谨的方法和原则把专家提名转换为专科提名分数：专家提名第1位的，计10分；提名第2位的，计8



分；提名第 3 位的，计 7 分；提名第 4 位的，计 6 分；提名第 5 位的，计 5 分……将专科提名分数相加，就得到该院某个专科的等级分。

对于科研学术水平得分的计算，除了计算医院前一年度发表 SCI 论文影响因子的总和，得分还根据该院前一年度各国家级自然科学、科技进步或发明类奖项作为加分项（一等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得分加 10 分，二等奖加 4 分……最高可加到 100 分）

为了强调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使更多的医院能够进入公众的视野，今年的排行榜还首度推出了按区域排名，分别为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华南区、华中区、西南区和西北区，使入榜医院再创新高，达 534 家，成为了本年度排

行榜的亮点。北大口腔医院也当之无愧地问鼎华北区口腔专科第一名。

综上，榜单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可见一斑。复旦版最佳专科排行榜也逐渐成为全国医院学科的标杆和患者的就医向导。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连续获得该项殊荣，是社会和国内同行对医院医教研水平的认同，也是对北大口腔医院全体教职员工的鼓励和鞭策。进一步引领国内口腔医学事业的发展、持续增强国际影响力始终是北大口腔医院持续发展的前进方向。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 人民医院黎晓新教授在美国眼科学会 2015 年会作主题发言

2015 年 11 月 14 日至 17 日，2015 年美国眼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AAO）国际视网膜大会（Retina Subspecialty Day）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召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黎

晓新教授作大会发言，这是国际视网膜大会上第一次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美国 AAO 大会作为全球最大、最广泛的眼科研究科学会议，此次的大会主题为“加大赌注”，预示视网膜治疗领域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黎晓新教授在

大会的 Uodate 专场应邀报告了康柏西普治疗中国人高发的 AMD 亚型 PCV（息肉状脉络膜血管病变）的情况。

30 多年来,黎晓新一直坚持在医疗、教学和科研一线,是我国眼科界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的开拓者之一。她将基础科研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在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复杂性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外伤的手术治疗、眼部肿瘤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手术治疗和视觉电生理等领域的诊断与手术治疗等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她跟踪世界眼科发展的前沿,挑战眼科疑难病症,为广大患者解除病痛,使上万名患者重见光明。为了预防和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她联合了儿童医院、妇产医院等单位开展筛查工作,牵

头制定全国防治指南,极大地降低了我国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她创建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童眼病中心,为保护儿童的视觉健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疑难儿童眼病在她领导的中心得以治愈。她热心于我国眼底病事业的发展,经她培养的几百名学员在国内各地发挥着诊治眼底病的生力军作用。她领导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已经成为教育部重点学科、国家卫生计生委重点专科。她主编了《视网膜玻璃体手术学》《现代眼科手册》等多部学术专著,并多次应邀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进行学术报告,提高了我国眼科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 日本大分大学访问团到人民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交流访问

近日,日本大分大学副校长大桥京一带领大分大学访问团一行六人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交流访问。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副院长刘玉兰,副主任刘开彦,副处长张华等与日方教授进行了座谈,双方就两国新药临床试验审批与实施、伦理委员会建设与审查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座谈会现场

刘玉兰首先对大分大学大桥京一访问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人民医院的历史和医疗优势、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伦理委员会及 I 期临床试验研究室的基本情况。接着，大分大学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临床药理学教授上村尚人介绍了日本大分大学医院临床试验中心的责任分工、组织架构、临床试验承接情况等情况。

大桥京一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双方就新药审批的趋势、临床试验的设计、机构人员的组成及伦理审查的一致性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文/王璠珏 陈明）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山石

##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一行来访

11月13日上午，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atricia D'Alesandro Pelosi）率民主党联邦众议员一行来访。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赵杨及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袁明等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大厅迎接来宾，并向其简要介绍了学院及方李邦琴楼的基本情况。双方互换礼物后，佩洛西一行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会议室与北大师生代表进行座谈。

座谈开始，袁明教授首先对佩洛西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回顾了20年前与佩洛西议长在美国偶遇并亲切交流的往事。佩洛西对此表示荣幸，她指出，美

中学生交流对两国加强沟通不可或缺，



年轻人是国家发展的未来，因此她很愿意倾听青年一代的声音，解答他们的问题。

座谈围绕全球环境问题展开，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及学生代表就如何看待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中美两国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



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以及即将在巴黎召开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问题。佩洛西及各议员一一回应，佩洛西强调，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重要，是影响广泛的重大议题，美中两国在全球环境保护方面的领导示范作用至关重要。在谈到中国近年来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贡献时，佩洛西给予高度肯定，她说，美方也将全力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尤其是在相关科学研究方面的发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佩洛西充满信心，表示乐观。（文/王子怡）



南希·佩洛西回答师生提问

**背景链接：**

南希·佩洛西(Nancy Patricia D'Alesandro Pelosi)，美国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自1987年起担任加利福尼亚州第八国会选区议员，是历来职位最高的女性联邦官员，也是首位担任议长一职的加州人和意大利后裔，2007年-2010年，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 网教之声

### 五大在线教育领域现状与先机

2015年11月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第38次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教育2030行动框架”发布，教育的使命被扩大至全纳、公平和全民终身学习，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本文摘编“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部分重要内容，呈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未来15年教育发展的目标、策略和指标。

#### 给每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

教育，是“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教育2030”）的核心，也是成功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在教育愿景的鼓舞下，新教育议程将改变个人、社区及社会的生活，不让任何人掉队，关注全民教育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的未尽事业，并致力于解决全球当前和未来的教育问题。

自2000年以来，“教育2030”的创新点在于通过终身学习增加或扩大教育机会，保证全纳与公平、教育质量和学习成果。通过《仁川宣言》，教育界根据整体的发展框架树立了新的教育目标。新教育议程关注全纳与公平，即给

每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不让任何人掉队。所有人，不论性别、年龄、种族、肤色、民族、语言、宗教、政治及其他政见、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状况，无论是残障人士、移民、原住民、青年和儿童，尤其是处于弱势或被边缘化的人，都应当有机会接受全纳与平等的优质教育，并享有终身学习的机会。新教育议程关注教育公平、学习及技能，强调避免只专注教育机会却不重视学生在入学后能否获得相关技能。若按照目前的发展进度，许多国家到2030年将远远落后于新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改变目前的方式，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调动各种资源和力量。因为如今，教育必须应对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技术进步、城市化、移民、政治不稳定、环境恶化、自然危害与灾害、自然资源竞争、人口结构挑战、全球失业率的上升、贫困的持续、不平等的扩大等因素带来的问题。

到2030年，教育体系将招收数以亿计的儿童及青少年来完成基础教育（学

前教育、小学教育及初中教育），并为全民提供平等接受高中及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提供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来确保他们日后长期的发展、学习及健康。教育还要确保所有儿童、青年及成人正在学习并掌握读写等相关技能。目前，迫切需要开发贯穿一生的灵活技能与能力，因为人们需要在一个更加安稳、可持续、相互依存的知识型及技术驱动型的世界里生活和学习。

“教育 2030”将确保所有人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发展创造性及批判性思维和协作能力，培养好奇心、勇气及毅力。

为了人类、经济、社会 and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注教育目的和相关性是“教育 2030”的典型特征。这样的愿景超越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并整合了人类生活的多个层面。教育提高全球公民意识及公民参与度，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还将推进跨文化对话，尊重文化、语言的多样性，这对于实现社会和谐和公平至关重要。

发挥教育的力量就需要在世界各地创造更多的机会，尤其是在有冲突的国家及地区，因为这里存在大量的教育差距。因此，面对冲突、社会动荡、自然灾害，我们需要建立具有弹性和应对性

的教育体系，并且确保在危机、冲突中及冲突后维持教育发展。更好的教育也能预防冲突、缓解紧急状况及维护和平。

基于国际契约和条约，“教育 2030 行动框架”建立的原则是：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和适应性权利。为了实现这项权利，各国必须确保每个人公平地接受全纳的优质教育和学习，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教育应当致力于个性的全面发展，增进相互理解、包容、友谊及和平，教育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国家是责任的主体，国家的作用是制定和调整规范及标准。民间团体、教师及教育工作者、家庭、青年及儿童在实现优质教育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性别平等与全体教育权利密不可分。实现性别平等要以权利为途径，来保证女童和男童、妇女和男人获得完整的教育，且公平地完成教育。

### 七大目标勾勒全球未来教育蓝图

“教育 2030”的目标清晰地勾勒出全球教育的未来蓝图，鼓励各国努力加快发展。各国政府根据教育优先、国家发展战略及计划、制度能力和资源可利用性，将全球教育目标转化为可实现的国家目标。



**目标 1: 到 2030 年, 确保所有青少年完成免费、公平及优质的小学和中学教育, 并获得有效的学习成果。**

各国应落实政策和法规, 确保提供 12 年免费的、公共资助的、全纳的、公平的、有质量的初等和中等教育, 其中至少包含 9 年义务教育。各国应当延长免费义务教育年限, 达到世界基本水平; 明确标准及审查课程来确保质量及背景相关性, 包括技能、能力、价值、文化、知识及性别等, 鼓励社会各界 (青年及父母) 参与学校的领导及管理, 提高制度的有效性及高效性; 更加公平地在优势和弱势学校中分配资金; 在多语言背景下, 促进双语及多语言的教育; 为处于小学及中学年龄段的失学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和教育方式; 构建更加强大的、全面的评价体系, 评估学生在关键节点的学习成果, 例如小学、初中教育结束时期。

**目标 2: 到 2030 年, 确保所有儿童接受优质的儿童早期发展、保育及学前教育, 从而为初等教育做好准备。**

各国应落实整合的、全纳的政策及法律法规, 保证至少一年有质量的免费学前教育, 通过幼儿保育和教育, 关注

最贫困及最弱势的儿童; 通过营养、健康、社会和儿童保护、卫生和教育等部门的合作协调, 来落实整合多部门的政策及战略; 设计和实施全纳、可实施、整合的计划和服務, 并建设儿童早期教育的优质基础设施, 包括健康、营养、安全保护和教育需要, 特别是对残疾儿童, 并倡导父母是儿童的第一照顾者。

**目标 3: 到 2030 年, 确保所有人负担得起优质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

各国应制定职业技能发展和高等教育间的跨部门政策; 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 特别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 确保高等教育资格的可比性及认可度, 促进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学分转换; 利用资助和技术运用, 制定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远程学习政策及计划, 包括互联网在线课程及其他符合公认的质量标准的方式; 制定促进高等教育研究能力发展的政策, 鼓励学生尽早接触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 加强高等教育及研究项目的国际合作, 这包括在全球及区域公约框架内互认高等教育资格; 发展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 为所有年龄段的人提供教育培

训机会；包括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支持和促进政策的发展。

**目标 4：到 2030 年，全面增加拥有相关技能的人员数量，该技能包括为就业、获得体面工作及创业的职业技术技能。**

各国应收集并应用变化的技能需求，从而引导技能的发展，减少不平等，应对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社会需要及非正规经济及农村发展；社会合作伙伴设计和实施教育培训项目，确保高质量的职业技能课程和培训项目；促进不同形式的（基于工作和基于课堂）培训和学习的发展；确保透明及高效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TVET）质量保障体系和资格框架；促进通过国际合作提高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资格证书的透明度和认可度，确保工作者和学习者的流动性，保持培训计划与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步；创建在正式及非正式场景中灵活的学习途径，并设置相应的衔接课程和职业指导和咨询服务。

**目标 5：到 2030 年，消除教育上的性别差异，确保残疾人、原住民和弱势儿童等弱势群体享有平等接受各层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机会。**

各国应确保教育政策、部门计划和预算一定是反歧视的，确保教育公平，并为弱势及被排斥的群体开发有针对性的紧急策略。创建指标以评估实现教育公平的进展；确保教育政策、部门计划和预算规划要防范和应对教育紧急情况；明确、监测并提高女童和妇女接受素质教育的机会，提高她们的参与度和毕业率；明确弱势儿童和青年接受素质教育计划的障碍，采取平权行动来消除这些障碍；支持使学校抵御各种灾害影响的综合方法，包括更安全的学校设施、学校灾害管理和风险减少及复原能力的教育；提供远程教育、信息通信技术培训，并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确保使用多源数据和信息，包括来自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和相关学校及家庭的调查；收集关于残疾儿童的数据，对不同的残疾和障碍人群进行分类和评估，并利用数据来建立制度计划和政策的指标体系。

**目标 6：到 2030 年，确保所有青年和绝大部分成年人实现读写和计算能力。**

各国应建立一个多部门的合作方式来制定文化政策、计划及预算，加强教育、健康、社会福利、劳动、工业和农业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根据

国家评价机制，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并基于他们先前的知识和经验，来确保读写和计算课程的质量；扩大有效的成人读写能力和技能项目，并建立在他们丰富的经验和实践之上；促进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开发读写能力评估框架和工具，来评估学习成果。

**目标 7：到 2030 年，确保所有学习者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确保教育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人权、性别平等、促进和平和非暴力文化的发展、文化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各国应发展政策和项目来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ESD）和全球公民教育

（GCED），并通过教育系统内的干预措施、教师培训、课程改革和教学法支持，使它们成为教育的主流；为所有年龄段的学习者提供能终身获得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机会；创建并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推广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的良好实践，以便更好地实施教育项目，加强国际合作和理解；促进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相关的项目，让学习者和教育者参与到社区和社会中来；确保教育承认文化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支持可持续

发展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更有效评估教育系统的发展、认知、社会情感和行学习成果；确保可持续发展教育和全球公民教育存在于所有水平和所有教育形式之中，促进和平和非暴力文化的发展。

### 保障终身受教育权

全民全纳教育应该得到基本的保障，应该通过实施具有变革性的公共政策，应对学习者的多样性需求，解决教育机会不平等、少数人群被边缘化、教育质量不一致和人群歧视等问题。“教育 2030”特别关注性别和弱势群体歧视问题，努力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

为了实现“教育 2030”的目标，需要调动全球各个国家、区域的积极性，形成有效、全纳的合作关系；改善各国教育政策和合作方式；确保全民接受公平、全纳和高质量的教育；调动各方资源，保证教育资金的充足；确保监测、落实并审查所有教育目标的指标。

### 保证基本政策与法律建设

大量国际标准条例都在保护受教育权这项基本人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例，如条约、公约、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国际文书，为受教育权建立了牢固的国



际规范框架，没有任何歧视和排斥。在各国政府的主导下，多方利益相关者应该参与审查并采取行动，履行义务，制定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为素质教育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在新议程的实施过程中，各国应关注教育体系的高效、有效及公平。各国政府应该加强教育体系建设，建立和改善适当的、有效的和全纳的管理和问责机制，确保为受教育者提供优质的教育；应建立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和透明有效的融资程序和机制；应进行制度化管理，确保及时可用的数据资源，创新和信息技术必需融入教育体系和知识传播的过程。

### 强调公平、全纳和性别平等

各国应开发与改进跨部门政策或计划，应与“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一致，消除社会、文化和经济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剥夺了数百万儿童、青年及成人的受教育权。在国家层面设置相关基准，必须在教育内容、方法、结构和融资策略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从根本上解决特殊人群被歧视和被排斥等问题；应利用基于数据证据的政策来解决相关教育问题；为学校提供校餐、营养指导和健康服务以及教学材料和教育资

源的传输服务；应保证全纳教育的教师培训。另外，为了衡量教育边缘化的程度，监测教育目标的进展状况，各国应该收集、分类、分析教育数据，了解特殊群体的具体特点，努力促进教育的公平与全纳。

为了确保性别平等，各国教育部门必须消除由社会、文化或经济地位造成的性别偏见和歧视。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必须实行性别敏感政策，改善学习环境；应消除教师培训和课程监控过程中的性别问题，消除教育机构中的性别歧视和暴力，确保教学与学习在性别上的平等。另外，考虑到残障人士在接受教育时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影响，各国政府需要特别关注残疾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确保他们有机会接受素质教育并取得成果。

### 关注教育和学习质量

各国必须通过具体措施来提高教育质量，增加教育机会。各国教育机构应该有充分公平的教育资源，有安全便利、环境友好的教育设施，有足够的优质教师和教育者，使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有各种书籍和学习材料，有开放的教育资源和技术。这些都能促进全球学习者接受全纳教育。

另外，各国应该实施教师政策和条例，确保教师和教育者能接受良好的培训，获得专业资格并受到激励，并取得足够的酬劳，确保他们能够在整个教育系统内被公平有效地管理和流动；各国应当制定学习质量评估体系，保证教育评估的监测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性。在认知和非认知领域，教育部门必须明确相关的学习成果指标，并将其作为教学和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来持续地评估。素质教育应保证受教育者的技能、价值观、人生观和知识体系的发展，使他们过上健康和充实的生活，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并能应对地方和全球的生存挑战。各国还需要关注教育质量和创新，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学科的发展。

### 促进终身学习

所有年龄群体都应该有机会接受教育。各国应通过制度策略和政策，将所有人的终身学习嵌入教育系统，并渗透到教育的各个层级，这要求在所有年龄段和各个教育层级上提供多样、灵活的学习途径、入学机会和重新入学的机会，加强正式和非正式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加强通过非正式教育机构获得知识、技能和能力的验证和认证。终身学习还包括接受优质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

公平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公平机会，并得到相应的质量保证。

此外，各国应该为所有人，尤其是女童和妇女，提供教育机会，来促进公民的读写和计算能力，使他们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技能和体面的工作。重要的是，各国应该利用教育、科学和技术、家庭、职业、工业和经济发展、移民、社会福利和公共财政等部门之间的跨越式合作方式，保证为成年人提供学习、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 解决紧急情况下的教育问题

自然灾害、流行病和武装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跨境流动，可能会给之后几代人留下精神创伤。很多人由于未接受过教育而无法使他们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复苏。

危机，是获得教育的主要障碍。在过去十年间，它拖延、逆转了全球实现全民教育目标所取得的进展。紧急情况下的教育，能为人们提供即时保护，提供救生知识、技能和社会心理支持，来帮助人们应对危机的影响。教育还可以通过技能培训来帮助人们预防灾害、冲突和疾病，从而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原标题：描画全球未来教育的模样

来源：中国教育报

翻译：上海师范大学胡佳佳、吴海鸥

编辑：丁香的花朵

## 教育部推出“公益+艺术+教育+网络”美育新模式

10月24日，由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首届社区美术教育交流大会在北京雁栖湖召开，同时举办了全国第三届美好中国国画大赛颁奖仪式。会议正式推出了非常新颖的“公益教学，免费学习”的美育理念。配合这一理念的落实，会议还隆重推出了“公益+艺术+教育+网络”的全民美育新模式。来自教育部、文化部的10多名专家学者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各界代表共同见证了新模式的诞生。

为大力推进社区教育发展、探索信息技术与社区教育的深度融合，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于2012年启动了社区教育模式创新i-实验项目，强调线上学习互动与线下体验交流相结合、动手动脑相结合、自主与协助学习相结合。北京美好文化艺术中心随即承建了其中的i-美术实验室并提出了“公益教学，免费学习”的教学思路和基于互联网开展书画艺术培训的工作计划。经过历时三年的摸索和反复论证，最终形成了以“传艺育人”为宗旨，以“公益教学，免费学习”为教学方式，以中国书

画、油画等相关艺术的鉴赏和创作为教学内容，以中国书画学堂为网络教学平台，面向全民开展美育教学工作的“公益+艺术+教育+网络”全民美育新模式。

会议上，教育部社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正式聘请了柯文辉、程大利等一批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作为平台的学术顾问，选聘了一批在全国展露出众才华的中青年书画家、油画家作为平台的特聘教师。从此，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时间，只要对书画艺术感兴趣均可到中国书画学堂与各位老师切磋技艺，享受免费专业指导。

9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发布。10月初，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媒体专访中指出，美育是我国教育的短板。

“公益+艺术+教育+网络”的全民美育新模式的推出，可谓应运而生，生得其时，随着全民美育的逐步推开，必将成为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力量。

来源：新华网  
作者：程建华



## ■ 北大人物

### 李爱国：冰雪相融 笔墨传情

泰戈尔曾说，艺术的魔仗所触之处，当变为不朽的现实。二教 107 教室墙上的《雪龙》这幅画就是很好的一证，其磅礴宏伟的气势与生动飘逸的细节令人精神一振——内蒙冬天的寒风从耳边呼啸吹过，骏马身上结了淡淡的白霜在朝霸映照下熠熠发光，天与地浑然一体，让人不禁激发出对这片茫茫大地的想往。



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是画家李爱国能带给我们的艺术享受。

#### 绘画：冰与火的强烈对比

冰，是唯美与抒情、古典与现实交融的阴柔之美；火，是烈日灼心、气势汹涌的磅礴之美。

翻开李爱国的作品集，不难发现，除了像《雪龙》之类气势磅礴的宏伟大作外，他还擅长画极富有女性柔美气息的水墨女人体画，这种阳刚与阴柔之美的对比展现了李爱国内心的冰与火。

“极少有画家能像我这样创作跨度之大，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我的双重性格。”他说。

凭借着扎实的绘画功底、广博的知识，以及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李爱国已经在绘画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风格。

李爱国创作的反映蒙古族历史以及战争题材作品，多以宏大的叙事背景和精确的人物细节见长。如《雪龙》《北方人》《套马手》《归》《蒙古骑士》《铁流》等一系列蒙古题材作品，形成雄浑、厚重的绘画风格，并且成功地探索出在生宣纸上表现霜雪中的蒙古马和骑手，意境深邃、独特，是他内心的团团烈火向外迸发的磅礴激情。

他的工笔人体画是东方意蕴和西方造型观念融合的典范。他大胆运用超现

现实主义色彩，在他的画作里既有西方透视学与解剖学的严谨，又不失东方传统审美习惯的平光式的手法，并辅之以浪漫色彩的动植物作为背景，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

除了传统的中国画法外，他在西方范式的绘画创作方面的尝试也可以看出其功力之深，这一点在他为全国文联组织的“联合国大家庭”作品集创作的《哥伦比亚的阳光》这幅画中可见一斑。这幅画是他在学习保罗·高更的画作之后所作，散发出浓郁的拉美风情，同时大片绿色的植物画又透露出自己性格中的克制，这幅画将他性格中的热情与冷静体现得淋漓尽致。



近日，李爱国的中国画在北大理教展出，开幕式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代主任刘晨赞扬说：“李爱国老

师的作品笔力强劲，用墨淡雅，日后必当为传世名作。”

### 讲台：安身立命之所

2006年，李爱国来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教，目前教授本科生两门课程“水墨画”和“中外美术创作比较”，他的课强调同学们自己动手实践，特别是水墨画课。“我陪他们一起画，这样同学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一些画画技巧。”他说。

除了教授本科生课程外，李爱国每年10月还会带高研班的学生去张家口写生。10月的张家口已经非常寒冷，有的学生觉得在这样的天气下写生太苦，但李爱国每次都会坚守到最后，以身作则成为学生们的榜样。“我每次都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走，这得益于我在东北的‘新兵训练营’一个月的训练。”他笑着说。

2003年暑假，李爱国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开设国画暑期课程，虽然语言沟通不便，但他娴熟的绘画技巧依然受到了美国学生的一致好评。课程全部结束了，李爱国收到了签有全班学生姓名的祝福卡片。

“教学效果相当不错，美国的学生很喜欢提问，课堂气氛非常活跃。”他

说。爱荷华州立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马克希望这一次是长期合作的开始。

这次美国之行，李爱国细腻的工笔画让美国学生看到了古老中国的神秘，为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锦上添花。今年10月，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会长斯蒂芬·欧伦斯(Steve Orllins)先生的邀请，李爱国出席了该会成立49周年颁奖晚宴。其间，李爱国近年创作的《夕照三峡图》和《大江东去图》两幅中国山水画作品，被作为荣誉奖品分别颁发给全美最大私募基金黑石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和全球最大药企辉瑞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晏瑞德(Ian C. Read)，以表彰两人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同时也是对李爱国画作的高度肯定。

三尺讲台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大千世界绘于他画笔之下，李爱国以教书为业，以谦卑为礼，在艺术殿堂里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为人们带来不朽丹青。作为一个画家，李爱国在艺术的殿堂里徜徉自如，而作为一名教师，他将自己的人生智慧传播得更广，换来教学上的一席之地，受用终身，并将在内心冰与

火的抗争中用笔墨传出更加真实的情意，再创高峰。

### 生活：淡泊与热烈的融合

对李爱国来说，生活的意义不亚于绘画创作。艺术作品是生活的反映，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艺术之外，他有自己的广阔天空。

李爱国喜欢用耳朵发现这个世界。他作画的时候喜欢听音乐，特别是创作到高潮时会听《1812》序曲、《走进非洲》以及《我的祖国》等曲目，音乐滋润了他的画笔。他还喜欢听各种各样的评书、电影、小说连播、纪实文学，这些素材给他带来了创作的灵感。他对历史和军事理论相当敏感，说起三大战役来滔滔不绝。他对中外经典电影和大型纪录片也涉猎较深，他笑言：“听了这么多年，把耳朵都养出来了，以至于现在写东西、画画也信手拈来。”

除了用耳朵听，李爱国还用心认真观察生活。

一个偶然的时机，他听说中蒙边境的一个旗有一千多匹纯种蒙古马，他请求朋友寻找到这些马，在一个寒冬带着学生去写生。为了能够观察到秋冬之际破晓之前蒙古马身上才会有的霜，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他拂晓便与几个学生，



在零下几十度的极端低温天气情况下，看到了这一壮观景象。

“当时这些马还睡眼惺忪，身上的白霜还没有消失，一按下相机快门，快门声使马惊跑了起来，在雪地上留下了一排排蹄印。”他津津有味地回忆道。

艺术创作是一个辛苦的过程，而李爱国却乐在其中。

有一年冬天，在他内蒙写生的回程途中，因为车陷在雪里，需要不断挖雪、推车，而皮帽子前一天又丢在了蒙古包里，耳朵都差点被冻掉了。“耳朵掉了我怎么戴眼镜啊，没了眼镜我可不能看东西画画了，难不成还脑袋上安个螺丝挂眼镜？不然像梵·高一样还挺酷的。”他幽默地自我解嘲道。

艺术创作成了李爱国生活的全部，他对电脑、微波炉、洗衣机、开汽车等没什么兴趣，也不喜欢开会。他在画室从不装电话，以确保这块天地的宁静。

家人的照顾是李爱国安心创作艺术的力量之源。“我不会用电脑，平时查收邮件都得靠我爱人，有时候下班也得麻烦她来接，她在工作之余还要处理我的琐事。”他说。

“我越来越发现很多应该了解的，我却一无所知，在知识、文化的瀚海里，我是那么渺小的一粟，我需要文化的积淀、积累，就像喜马拉雅山冰川积累区的多少，决定了它在消融区融化出多少雪水，这雪水又汇成了大江和大河！”他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到。

李爱国的人生哲学让他免于世事纷扰，专心在艺术创作这个世外桃源认真耕耘，寻求本真，这份生活的淡泊与对艺术浓挚的激情让他的生活别有一番风情。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 濮祖荫：祖法先哲 荫及后学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

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我去给你们倒杯水！”他走进办公室，放下手里的两个大袋子，开始翻找纸杯和咖啡。我们起身连忙辞谢，他却早已走出去，串了两三个办公室终于借到纸杯，又快步走向水房。我跑了两步，追到开水房，接过水杯。

“北大不仅培育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培育了好几代人，我对北大很有感情。”他开门见山。

他就是濮祖荫老师——我国“双星计划”的发起人之一，2012年度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国际奖”获得者，“忧郁王子”朴树的父亲。除了花白的头发，其敏锐的思维、矫健的步伐、清晰的逻辑，让人很难把他与七十八岁的年龄联系起来。

### 最好的年纪，最奋发的祖国

“我们这一代人有深深的时代烙印，想着国家的未来，我希望我们的后代也能看到这个，不要只看当下，看钱

看经济。”说到激动处，濮祖荫用食指和中指不断地叩击桌面。

濮祖荫出生于1937年的上海，正是抗战时期。三四岁时他随着母亲和舅舅逃难到重庆，与先期到达的父亲汇合。他和妹妹被家人用扁担挑着，时而坐船，时而翻山，历经数月才到达重庆。年幼的他也许不记得颠簸的艰辛，却记得这一路经历的危险。“我亲眼看到车从山路上滚下去，当时山路72弯，司机一不小心就打滑。我当时虽然小，但是小也害怕，就叫了起来。”

濮祖荫在重庆中农小学念了三年书，1946年后回到南京，在南京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他对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1953年至1955年。那时，濮祖荫正在读高中。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终于结束了上百年屈辱和十几年战争的中国，百废待兴，从官方到民间，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要把落后的祖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新中国。昂扬的氛围极大地感染了风华正茂的少年，多年以后，濮祖荫依然深深记得那时空气中弥漫着的奋斗气息，“大家都向往着祖国、向往着人民、向往着中华民族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很怀念这种纯真的少年时代”。

少年时代的烙印是深刻的，快要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心心念念的还是社会主义理想。“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是一种公平富裕的社会。至于说什么是完整的社会主义，我说不清楚，但是我们得有这个目标，青年人得有这个追求。”

这种氛围对高中生的影响是直接的。“我们一心一意学习，把考大学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时候，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兴趣并无明显认知，大多抱着“国家需要什么便报考什么专业”的心态，有些人甚至阴差阳错选了一个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专业，并交付了一生时光。然而，濮祖荫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源于他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对国家需求的把握。

“我不一样，我对物理数学特别感兴趣，我就瞄准了一个目标，以后在数学物理领域发展。”提及少年时的选择，濮祖荫笑道。而在他心中，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是科学民主的发源地。所以，他选择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高中毕业后，毕业班举行活动，大家假想自己已毕业十年，以不同的身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回到学校。立志要在物理领域作贡献的少年濮祖荫假想自己

是个物理学家，“戴个帽子，穿个皮衣就参加了班上的活动，很罗曼蒂克的理想”。

濮祖荫一生最欣赏北大的地方在于北大严谨、踏实的学风、教风。而这个印象最早源于他的老师们。“给我们教书的教授，包括年轻的讲师助教，他们有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教风，非常有风采。”五六十年后再回忆，濮祖荫对那些老师们赞赏有加，他连连感慨：“大师有大师的风范，青年教师有青年教师的风采。”

教原子物理的褚圣麟是濮祖荫印象最深的老师之一。“他能讲出原子核的奥秘，激发我们的兴趣，每节课都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他不是照本宣科，他手背到后面，在不大的讲台走过来走过去。”回忆到这里，濮祖荫把手背在了后面示范褚老师当时的姿态，“也不写几个字，也不看讲义，但是一堂课讲下来收获很大”。

王子茜教濮祖荫热力学统计物理，每次下课濮祖荫都会去问他问题，王子茜总是回答一半，另一半让濮祖荫自己去研究。“他不会你问什么就答什么，而是启发你去钻研。这种老师，简直是不可想象。我以后讲课也努力把这些东西加进去。我不知道别的大学是否是这



样教的，不知道北大是否唯一，但是我看到了北大，看到了北大的老师。”

### 初次踏进科学的大门

“我跨进科学大门的第一步是赵先生领进来的，我这一生都受益于赵先生。”濮祖荫口中的“赵先生”就是著名物理学家赵九章先生。

1958年，全国开始大跃进，北大也不能避免，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在这样的气氛下，物理系提出要新建一批专业，开辟一些新的方向。而这年前后，苏联与美国先后发射了卫星，中国受到震动，配合卫星研究设计高校课程成了学校与政府的共识。这就需要一直以研究地震为核心的北大地球物理专业开始发展高空学。

1958年底，北大物理系一分为四：原子物理、无线电物理、地球物理、物理系。而地球物理的重心便是研究高空，但是北大既没有此方面的教师，更没有相关课程。“没有人研究过，它需要新的物理基础——等离子体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的重要分支便是磁流体力学，北大想要开这门课，却找不到老师，就从二三年级学生中找出有潜力的学生来培养。三年级的濮祖荫就这样被调了出来。

“调出来后，叫我去物理理论专业听课。学校还组织了等离子体攻关小组，我也参加了。我的命运就这样，以后在这个方向一千五十多年。”

那时候，赵九章先生在科技大学办了一个空间物理专业，并且开设空间物理课，请了一些年轻老师过来讲科研问题。濮祖荫跑去听课，发现了新的研究点，“我听了后觉得这里面有个问题，他们做到的这个地步，好像我可以进一步往前做。当时我年纪轻嘛，就接着做，做了后写了点小东西，拿给讲课的老师看，那位老师把文章转给了赵先生。赵先生看了后觉得做得挺好，就把我叫去了”。

事实证明，濮祖荫所谓的“小东西”把“磁暴磁体离子变化的研究”推进了一步。赵先生认同他的研究，鼓励他继续做下去，并把濮祖荫吸纳到他的空间物理研究小组中。

五六年级时，濮祖荫开始教授磁流体力学课，他的同学也是他的第一届学生。“我很尴尬，他们学得比我好，我怎么好意思。好在他们都没听过，对他们来说充满新鲜感。”其实为开设这门课程，濮祖荫认真研究了好一段时间。第二年时，濮祖荫从低一年级的学生中挑出两个，带着他们一起做“磁暴磁体

离子变化”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在地球物理学报发表了。

濮祖荫对赵九章先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是赵先生教会了他们做科研。除了讨论交流的方法论外，赵先生还引导濮祖荫的思维从“习题法”转向了“模型法”。在习题法中，他习惯于通过已知推导未知，他的第一份工作便是采用这种方法完成的，但是这种办法只能找出一个粒子的位置，不能推出一群粒子，在物理界并不适用。



濮祖荫一家人，1978年摄于北海公园

“物理，它不是自然界本身，研究物理就要建立模型。”他以种植黄瓜为例解释这个问题。“黄瓜长得好不好，因素太多了，土壤呀，空气呀，水呀，

我们怎么知道谁影响了它？这就需要控制变量。物理也这样，研究自然界的一个现象，要抓住本质，做一个简化模型。建立一个恰当的模型后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样这个难题才能解决。”

濮祖荫的第二份工作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完成的。他要探究附着在磁暴磁体里电子的运动，把磁暴假设为均匀的负的磁场加到地磁场上，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带电粒子是怎么运动的。有了这个模型后，研究进展很快，而这项研究是他和师兄刘振兴一起完成的。濮祖荫说这也是赵先生的启发，“在他领导下我们都是合作的，我们互相看长处，不计较哪个人贡献多哪个少，不用计较谁的名字在前面，只要把科研推进一步就好”。也是这项研究从此开启了濮祖荫和刘振兴长达五十年的合作历程。

1961年中国乒乓球选手庄则栋获得世界冠军，赵九章鼓励大家要像中国乒乓球选手们一样，打到世界舞台上，要有当冠军的气概，这对濮祖荫激励很大。年轻的濮祖荫充满憧憬、充满斗志地投身到科研的大海。

### 国家送我们出来就得拼命学习

“国家在百废待兴时花那么多钱把我们送出来，每月400美元，相当于4000

人民币呐，所以我们一心学习。在东德时，德国人都回家了，我们还在学，亮着灯光的窗户总有一扇是我们的。”

文革后，濮祖荫的研究工作逐渐恢复，但是封闭的十年中，国际上空间物理学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正在研究什么问题都是他所不知晓的。“我们只能找点小问题，发点小文章，没什么意思，也做不出什么。”

改革开放后，濮祖荫凭借着年少时的英语基础成了第一批出国的访问学者。为了提高英语听力，出国前，他买了录音机和磁带，每天反反复复地听。三个月后，他到了 UCLA（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的空间物理学水平居于美国大学前列，集中了这个领域最著名的五位科学家。

濮祖荫在那里看到了空间物理的学术前沿，了解到了空间物理学的研究方向。他感慨道：“一封闭你就什么都不懂了，看见树木看不见森林，从期刊上找一些零零散散的研究，但是看不到宏大的面。”文革后，濮祖荫在国内的研究模式是读别人的论文，然后寻找这篇论文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做改进，所以他的研究只能跟着国外走。这样也能出成果，但是对濮祖荫来说，这些成果毕竟太小。“跟着做的结果就是你看不到大的方

向，没有大的框架，不会找到自己研究问题的重点和意义。”

在国外仅半年，濮祖荫便完成了自己的课题，并发表了研究成果。他的导师 M. Kivelson 让他从自己的课题里选一个方向。濮祖荫欣喜地发现导师的方向中有关于磁层等离子体边界不稳定性的研究。这个方向正是十几年前赵九章先生带着他们一起做的，只是当时更多地停留在概念和想象的层面上，濮祖荫便选择了这个方向。在 UCLA 的两年里，先进的科研条件、广阔交流平台让濮祖荫的研究登上了新的台阶。他和 Kivelson 教授的研究成果最终澄清了过去人们对磁层顶 K-H 不稳定性的困惑和争议，用精妙的理论增进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有一天，一位美国学者看到濮祖荫的研究后非常惊讶，认为这项研究非常重要。“我就问他为什么重要，他说这个量别人的是素数，你做的是负数，素数的话这个波永远透不进去，负数就能传播了。我才恍然大悟，然后接着往前做。”而这项研究是濮祖荫备受业界赞誉的主要成果。“你不要停留在别人做了什么，你去改进别人做的，你要去找在你这个学科中有意义有价值的方向。”



从此以后，濮祖荫做东西都会考虑它的意义和价值。

在国外，濮祖荫对空间物理学也有了新的认识，那便是一定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在过去国内研究空间物理有个偏见，认为观测资料的分析没有太多用处，“但实际上做我们这种空间物理，一定要把理论和观测现象结合起来，用理论解释观测现象”。

而国外科学家们渊博的知识面也给濮祖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年，濮祖荫 42 岁。

在美国的两年间，濮祖荫除了偶尔去 garage sale（家庭旧货出售活动）淘些便宜的生活用品外，其余时间都在学习。他的想法很简单：“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把我们送出国，花了那么多钱，我们就得一心学习。”

通过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加上在北大读本科时打下的坚实基础，濮祖荫逐渐参与到了国际学术活动中，有了国际影响。回国后，他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回首往事，他认为“我真正的科学活动就是在那里开始的”。

### 科研非常有乐趣

“未知的世界有太多奥秘，数不清的问题摆在面前，我不知道能走到哪里，但我尽可能地向前走。”

1997 年欧空局启动了 Cluster II 计划，该计划试图用四颗相同的卫星，完成地球空间星座的探测。濮祖荫、刘振兴等人一起聊天，敏锐地看出了这个计划的缺陷。四颗卫星只能测量到影响源，却探测不到源对地球空间的影响后果。因为影响源发生在离地球二十个半径的地方，但是影响效果在 5 至 10 个地球半径的地方。“这样四颗卫星就不够了。”于是他们提出增加两颗卫星放在赤道附近，测算影响效果。这便是“双星计划”——我国首个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以中方为主的空间探测国际合作计划。国务院批准了这个计划，欧空局听到后非常高兴，派人与濮、刘二人交流，准备开展 cluster 和双星的合作。

1997 年 3 月份的香山会议中，有人质疑这个计划的意义，认为濮、刘二人只是欧空局的小兄弟。濮祖荫解释道：“两颗中国卫星有自己独特的作用。”

在双星探测的规划中，濮祖荫认为，向阳面磁层边界距离地心 10-12 个地球半径，磁层亚暴电流楔位于磁尾距地心大约 10 个地球半径的位置。他建议将双星-探测 1 号卫星轨道的远地点，从原定

离地心 8 个地球半径的高度增加到 10-12 个地球半径，以便探测 1 号和 Cluster 星座能在向阳面磁层顶和磁尾近地等离子体片实现联合观测。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并对双星计划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Cluster 上天以后，欧空局把探测资料刻成软盘，一张张地邮寄来中国，送到北大。濮祖荫和北京大学磁层物理研究组开始分析 Cluster-双星联合探测数据，开展了磁层三维多尺度物理过程的研究。但是研究开始时很不顺利，繁多的观测数据让他们摸不到头绪，“起步时各方面都很难，下载了数据但不会分析，画出了曲线但看不出眉目。好不容易想出了一个方法，我们很高兴，告诉 UCLA 发明了一种新方法，人家说我一年前就发表了。”

当时物理大楼正在修缮，濮祖荫和学生们在严冬中搬到“暖气不太好”的四楼图书馆，整天琢磨着怎么读数据，把数据“倒来倒去”。就这样不断摸索、不断学习，才开始迈出一两步。直到当年夏天访问美国波士顿大学，濮祖荫才开始撰写第一篇关于 Cluster 数据分析的论文。

磁重联是空间环境能量的来源，把能量转换成地球空间，此项研究在空间

地球物理中非常重要，关于磁重联的观测研究一直是磁层物理五十年来最重要的研究之一。但是这个研究的模型是二维的，真正的现象却是三维，而三维模型的设立离不开磁零点。所以几十年来，很多科学研究都在寻找磁零点。Cluster 上天后濮祖荫就想找到磁零点，带着研究生到德国去读 cluster 资料。“我们过去找磁零点，找磁场测量最小的地方，但是这样误差比较大，磁场越小，相对误差越大，必须从方法上更新。”

当时已在国家天文台工作的肖池阶向那里的同事们学习了微分几何的方法，知道用该方法计算彭加莱指数有可能判断磁零点是否存在。不久，当时还在大连理工大学工作的王晓刚教授也加入这项工作，三人组成的团队发挥各自的专长，并和国家天文台汪锦琇研究员、赵晖合作进行研究，找到了三维磁场零点结构存在的确切证据。这一结果对理解空间和实验室等离子体三维磁重联过程有重要意义，已被列入 Cluster 卫星发射十年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当时学界还对磁重联这一过程的理解有很多争论。早在 1987 年以前，学界就开始探讨“到底是反平行重联还是分量重联在磁层顶重联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濮祖荫与同事们利用 cluster 数

据发现，在相同的行星际条件下，反平行重联出现在远离赤道的高纬区域；分量重联发生在赤道附近。现在，这一结果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接受。濮祖荫对科学研究中的争论有自己的看法，“客观世界不是绝对排他的，不同的过程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大自然很奇妙，各种物理机制都可能在它的演化和发展中起作用”。

### 钻研教学，要对得起学生

“我觉得讲好课是一个教师的责任，这是你留给学生的唯一东西，是他要用一辈子的，做个好老师很不容易，但是我前面已经有了这么多好老师，我也要好好做。”

教学是濮祖荫生活中的另一重心，1982年，从国外回来后，他就承担起本科一年级基础课“电磁学”和高年级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任务，用科研式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着重讲授自己对基础理论理解的精华，并提出自己的质疑。

电磁学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最重要的基础课之一。接受这门课后，濮祖荫就开始钻研，“一定要把课讲好”是他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正好物理系崔敏全老师先开这门课，濮祖荫就像学生一

样，跑到物理系去听课，从头到尾从未缺席，连习题课都一节没落，他还跟物理系要来那些习题研究。“你不把这东西真正钻透，你就讲不清楚。”

当时这门课用的是赵凯华先生的书。此前，在学习时，濮祖荫对这本书早已非常熟悉，而等到他要讲课时，他重新翻书，每一页都较真，结果每一章里都发现了数不清的问题。他就跑去找赵凯华老师讨论，几乎每周一次，一去一晚上。“真是不好意思，把他们家门槛都踏破了，但是我又不能不去啊。”他笑笑，似乎为自己高频率的拜访有点歉意。

一位学生在网上留言道：濮老师的电磁学课生动活泼，他似乎知道你想听什么，总是能抓住你的注意力。学生只知道电磁学课好，却不知道濮祖荫的备课书上密密麻麻全是问号。“这样，我自己很有信心去讲课，不下这个功夫，我不敢讲。”

不仅要讲透彻知识，还得钻研授课方法。“你可以讲得非常流利、非常通顺，讲完后做习题，同学们就不会做了，我不认为这个课讲得是成功的，那是你灌（输）给同学的。”濮祖荫认为每一个知识点背后都有隐含的问题，这些问题学生自己发现不了，如果不点出来就



掩盖了矛盾。他选择的方法是基础概念和问题一起进行。“我讲完基本概念后，适当问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我再讲，但讲到一定程度就打住，留给学生们思考。”事实证明，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学生们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跟着思考。

他在考试制度上也另辟蹊径。他从世界各地包括 GRE 试题中搜寻题目，在自己的班上举行物理竞赛，竞赛前几名会获得五分、十分等期末加分作为奖励。

“我的学生最后有人得 105、110 的。虽然绩点只能算满分，但听起来好玩嘛。”想起这件事，濮祖荫被当年自己的创意逗乐了。

他利用课外时间让学生上讲台去讲习题，“哎哟，有些学生的解题方法真是比我的好呀。”提及这点，他非常自豪。而这样的竞赛不仅培养了学生的钻研精神，通过竞赛他也发现了一些人才。

“那个课题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还有傅绥燕（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党委书记），都是我通过竞赛选拔出来的！”他又笑了，发现人才让他略微有点得意。突然，他严肃道：

“对本科生我是尽了心的，我没有我那个时代老师的风采，但是我是尽了责任的。”

博士生的高等空间等离子体物理基础课程理论很深，概念很多，而且有不少数学内容。去讲数学，公式太多，学生们记不住；离开数学，又没法推进课程，数学背后有物理。物理要用数学表达，怎么处理两者的关系，是濮祖荫最头疼的地方，“我下了很大工夫处理这个问题”。濮祖荫曾经的博士生，现在的同事周煦之回忆道：“濮老师会一步一步推导，逻辑非常完整，每个知识点都是数学公式加物理现象来阐释。”但是濮祖荫并不满意：“我不能认为我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讲这门课，三十年了，只有不多的几章我比较满意。我还得不断改进；另外这门课得不断更新知识，所以我也得不断学习。”最近，磁重联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濮祖荫正在用最新的探测数据做最前沿的研究。



濮祖荫在美国地球物理学会授奖大会上致答谢词

“他努力不让自己落伍。”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傅绥燕老师说。

2012年，濮祖荫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AGU年度国际奖。在授奖词中，美国科学院院士Margaret Kivelson这样写道：“濮祖荫在他杰出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对地球磁层中磁化等离子体基本过程的研究，并启发和激励了不止一代的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

在濮祖荫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兢兢业业、攻坚克难，并时常感念他的老师们。他也始终尽自己所能传承着这种师风、教风，耐心地指导学生，与学生亦师亦友。他认为老师的责任是要把学生培养成超过自己的人。

“我希望以后能有比我年轻的学者获得更高的荣誉，在这一领域作出更多的贡献。”（文/离退休工作部学生记者缪亚敏）

（本文参考了《潜心治学五十载：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原文刊登于《北京大学校报》）

#### 采访手记：

濮祖荫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但工作仍十分繁忙，他像年轻人一样继续奋斗在科研第一线。因为家中有事，他最近住在顺义那边，每周二、四回学校与学生讨论科研最新进展。我本以为约采无望，但几条短信下来，老师竟十分干脆地答应采访。见面时，他说明接受采访的原因，他认为每一代北大人都有承上启下的使命。他在北大五六十年，对北大感情很深，他觉得是北大优良的学风、老一辈的老师们培养了他，所以他希望通过采访能把北大优良的学风传承下去。我本来就认为这是一件有趣而有意义的事情，和老师的一席谈话使我更加感受到这份工作的重量。有时候也惶恐年轻如我们，怕是不能很好地理解老师们在历经几十年岁月沉淀后的慨叹与言语，但也只能求尽可能还原老师们的精神与风采。与老教授们相处久了，看他们对学术的痴迷和挚爱，让我们年轻学生也倍受鼓舞。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 学者谈读书

### 叔本华：论读书

人类的知识大都是从眼睛输入的，用耳朵听来的东西，毕竟有限，所谓耳食者流所得到的知识，不外乎是一些道听途说，学生治学，固然要听，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读。英国大学里有些学校终年不去听讲，学校里也让他们如此，而且多认为他们是优秀学生，考试起来果然比每天去听讲的学生成绩还要好，因为勤读胜于勤听，名师讲授，同学共享，只有自修，才是一人独得。

古今的大学者没有不勤读的，囊萤凿壁，比我们现在的一灯如豆，还要不方便得多，但学问就是这样得来。苏东坡说：“读破万卷自通神”，可见学问并不难，只在多读，你如果手不释卷，必然会有成就，甚至偶然翻阅，也会开卷有益。

可是现在很少有人手上拿着书本。终日终夜，不理牌桌的人，我曾见到过，废寝忘餐，手不释卷的人，却尚未遇到。一般人买书，大都是拿来做装饰品的，永远陈列在书架上，很少拿到手中来读。这些书要他们去读，条件很多，第一得

有明窗净几，其次得有清闲，再次得有心情；地方不好不能读书，时间不长不能读书，心情不定也不能读书。懒学生还有一首解嘲的打油诗：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很好眠，秋多蚊虫冬多雪，一心收拾到明年。

阔公子有了明窗净几，又有的是清闲，但还是不能读书，因为他没有那种心情；穷小子终日忙于做工糊口，也没有时间读书。军人忙于打仗，商人忙于赚钱，政客忙于酬应，男子忙于做事，女子忙于说话，少年忙于寻乐，老人忙于怀旧，甚至闲人也忙于逛街，或坐茶馆，或凑热闹，似乎谁都不能读书。其实，他们并不是不能读书，而只是不去读书罢了。要读书谁都可以读，决不受任何限制，读书的条件，就在养成读书的习惯，其余皆不足道。

一般人为着生活关系，没有充分的时候去读书，这也是实在的情形，除了少数有闲阶级的阔人以外，谁都不免要为名利，或至少为衣食而终日奔走忙碌，如果一定要等到把生活问题解决了，闲



居无所事事，然后再来从容读书，这无异待河之清，可说永远无此机会。因为人的欲望无穷，等到生活问题，在布衣粗食之下可以解决的时候，他又想到美食暖衣，朱门绣户，即令有了丰衣足食，华屋良田，他仍然不肯罢休。所谓水涨船高，生活的标准既然随时有变，这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了。我认为要读书决不可等待那种无尽悠闲的到来才开始，应该随时随地利用空余的时间来读，把那种读书的习惯，直入我们的生活中去，作为我们日常工作的调剂品，那么，事也做了，书也读了，一点光阴也没有虚掷。

你不要以为 5 分钟做不了什么事，把 100 个 5 分钟集起来，就差不多等于一个整天。我常听见山与支架的人说，爱惜厨房里一粒米，就可以成为一笔家产。我们利用 5 分钟的余暇去读书，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

利用余暇去读书是轻而易举的，大家之所以不这样做，仅是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已。英国人在电车上读书的风气很盛，每天都要出外工作，起码有一个钟头在电车上，预备一本书专门在车上读，不过几天也就读完了，日积月累，一年读四五十本书，也不算稀奇。我们对于这种废时不去利用，实在未免可惜。

英国人利用废时读书，不仅在有规律的电车上，即在饭馆菜馆中亦莫不为然。至于在节假日，夫妇约好同出游戏，丈夫至多取一根手杖就可以出门，太太则不免要去戴顶帽子。可是每当那丈夫在楼下等着太太去戴帽子的时候，他照例翻开一本书来读，等他太太把帽子戴好姗姗地走下楼来，他手中的书，也就起码读完两章了。中国的丈夫却不晓得这样做，所以在楼下不仅独自等得心焦，而他太太一再地被他催促，也就老不耐烦，常常把一个快乐的计划，弄成不欢的结果。

如果大家都有了这种读书的习惯，不仅国民的知识可以逐年提高，而且闲事也就不会有人爱管了。枕边有一本书，可以免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苦，厕上有一本书，也就可以辟除恶臭。

我常想洋车上是一个很好读书的地方，拉到了车夫自然会停下，不像乘电车一不当心就驶过了目的地。可惜我现在只能走路，没有乘洋车的福分了，每天白白地在街上糟蹋了一两个钟头。哦，如果我能利用这种时间读书的话。

来源：中国好书

作者：叔本华

编辑：丁香的耳朵

## 杨绛：读书苦乐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干脆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是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的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和我们

同一个时代，会不会又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梯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产生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种种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只要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及早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多个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别做些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但书的世界却是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

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可以算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是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各种各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捡垃圾为生、盖报纸取

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的眼睛还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了“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来源：阅读时间

编辑：丁香的耳朵



## 好文共赏

### 专访北大社会学张静教授（下）

**问：**您在给本科生上“中国社会”的选修课，您是怎么样对本科生进行训练？让他们具备一种看待社会、理解社会的眼光，这种眼光您当初是怎么教给他们的？

**张：**中国社会这门课最早是原来孙立平在我们系开的，后来他去了清华就把这门课教给我了。我当时接这个课一方面是因为我对中国社会有兴趣，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课灵活度比较高，它不像社会学概论，你必须按照角色、结构、组织这些东西来讲，这个课相对来说灵活性比较高，所以我就非常愿意讲这个课。

但是这个课十几年下来以后，我发现我做了很多探索，因为我觉得，必须要非常了解我们的学生，去探索怎么样一种教学或研究，是更容易让他们接受和吸收的一种教学。

这方面我想了很多，逐渐的这门中国社会就开始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讲，让同学了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我讲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

组织、中国的社会思潮、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各种变化与社会变迁，过去是这样。逐渐的，到上学期和更上学期，最近这两次，我就改成用小片，就是视频小片来讲。一方面是我们的学生背景更为多元，之前我刚刚开中国社会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本科班，我们本科三年级的，那时候也就是四五十人，然后逐渐地到一些旁听的，有五六十人，然后逐渐地到现在双学位的、留学生，反正现在中国社会这门课每年有一百二十人到一百三十人的规模，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像讲座一样的课，这个课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与讨论就变得越来越难。

学生在这么大的场合之内不愿意或是不敢提问题，因为学生很多，你也没有办法去花很多时间去回答一个学生的问题，所以导致这个课程越来越像一个讲座，这是我很不满意的地方。

另外，就是学生背景多元。不是咱们原来那个本科班，不知道为什么这门课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我就想到用一些更直观的方法，比如前几期，我就

开始给他们放小片，放一个二三十分钟的，在中国社会中实际发生的一个故事或一个案例，当然要去寻找这些小片，要好好地筛选这些小片，因为不是任何一个小片都可以放的，一方面有一些意识形态的限制，这个你们应该也能理解，不适合在大的场合放的。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一些小片讨论的问题不具有社会学的知识，你把这个小片放了以后，不是光看这个故事，而是要把其中的一些知识点从这个小片中提炼出来。你比如说，什么和什么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知识点你必须提炼出来，你必须要精选小片。精选小片很难，我找了二三十个小片，请我们的博士生把它们都录下来，然后放小片讨论小片，从这个小片里面挖掘社会学的知识点。

**问：**您当时放的是纪录片什么的吗？

**张：**对，都是。不是故事片，都是在中国社会里发生过的情况，那就是纪录片。我基本上是从焦点访谈或者中央电视台一些新闻节目，我会去网站一个一个地看，然后我会选择哪些我认为具有知识点的，而且又是在中国社会中发生过的，并且这里面还不能有太多的说教。所以我就请我的博士生把里面说教

的内容去掉，只把故事把事实本身弄出来。用这个更直观地跟学生沟通，来满足不同背景的学生的需求。因为我们自己的学生，你可以讲得比较深，但是对外面的这些学生你就不能讲得太深。

第二点的改进就是，我就用辩论的方法，比如会提出一个问题，然后问同学有哪些不同的观点。然后把观点 A 与观点 B 设置为两个观点不同的队，然后让他们自己去组织材料，在课堂上进行辩论，这些大家都会听到不同的观点。同时参与了辩论来收集资料来增强他们团队的合作，能够更积极地投入思考，而不是只接受一种观点。

因为辩论一定是对立的观点，而对立的观点总是要说服对方，拿出自己的证据来。我觉得，通过这个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你要说服别人，不是仅仅你有一个观点就够了，你必须要拿出你的根据和理由，你才能够说服别人。怎么样把这个根据与理由挖出来，通过辩论是很好的方法。

**问：**您平时看电影或记录片这方面的东西多吗？

**张：**非常多。我非常喜欢看这些东西，但是要精选，我有的时候还问学生。比如上一次课放的，一个基层的开发区要招公务员的一个小片，招公务员的过

程是先公布消息然后考试，考完试以后这些学生的考试名次都排列出来，排列出来以后口试，口试完了以后录取，录取的十五人当中后来发现十三个人是当地干部的子女或亲属，就这么一个小片，我们就讨论这个，讨论的是公权力与私权的问题。

我当时就问学生，觉得这个做法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同学举手，觉得这个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举手，然后我让各自双边的人都谈论他们的为什么觉得可以接受，你要说你的道理，你为什么觉得不可以接受，你也要说你的道理，通过这个道理和理由的说明来让同学获得知识或观念。

**问：**您平时看的电影或纪录片对于您的学术研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张：**我觉得我是在学习，因为学习你不光是看书，我刚才说要上课，我要从这里面去寻找，因为课堂上不能什么东西都放，所以我要从中央台的这些节目里面，比如说从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去寻找。但事实上我看得最多的并不是这些，我自己平时其实是很少看之类的，这是为了教学的需要，我自己看的，一个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的历史纪录片，他们有一个凤凰大视野，经常放历史纪录片，我觉得相当不错。

另外我到世界各地，比如我上个月到台湾开会，我一定会去他们的书店买纪录片，不一定买中国自己做的纪录片，但是它是有关中国的，我会买很多这方面的纪录片，因为，纪录片跟你阅读一本书是一样的。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还有好多民间派的纪录片，你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不是所有这些纪录片都可以在课堂上放。我会建议同学们到下面去看，但是你不能在课堂上放。

**问：**您平时会有像米尔斯所说的那种学术档案吗？比如自己每天做个笔记、日记，把每天的所思所想用文档之类的整理下来，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张：**在十多二十年前的时候，我经常记笔记，有好多笔记本，到现在有可能有笔记本，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把当时所想的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你以后写作的时候就可能用到这些东西。还有就是看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在书的旁边写东西，把我当时想到的或对我启发的东西，或者是我的一个回应，我会写在书的旁边，这些东西逐渐积少成多，就像涓涓细水最后汇入河流最后再汇入海洋一样，它会成为你知识的一部分，潜移默化的，不一定能非常清楚的说出来。比如你哪一篇文章是从哪一篇笔记里发展出来的，但是如果它进入到你的



思考的话，最后它会对你发生作用的，我是有这个习惯，但是没有你说的那么正式，比如说去建立一个电子的学术档案，我每天想到什么，就能够在里面写，我家先生有这个习惯，他每天都做纪要，他每天干了什么事想了什么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流水账，但他每天都要记，我就没有这样。我看书的时候，我一定会写，如果这段时间我在写什么文章，我可能睡觉的时候或是走路的时候会想这个问题，但是我如果想起来，我马上会把它组合到我的文章里，我马上会把这些想法回去打开我正在写的一篇文章，我就写在下面。

**问：**这样看来，您的学术跟生活没有截然分开的那种边界，没有学术是学术，生活是生活那样，没有分得这么清晰的一种边界。

**张：**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比较特别，可能好多人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大多数的男性不喜欢他们的女友或者妻子有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我的生活确实很简单，除了运动或者旅行，别的时间里我都是在读书或者从事学术活动。学术就成了一种生活。

**问：**现在社会变化如此之快，很多学生对于未来有一种焦虑感、不安全感与不确定性，您觉得这种焦虑感与不确

定性正常吗？您觉得您那个时代和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未来和社会环境的感受会有显著的不同吗？

**张：**我觉得会有显著不同的。因为我成长的那个时代，社会变化先对现在来说要缓慢和更加可预测。你们也读过涂尔干的书，知道在大转型的时代人容易出现一种焦虑心理。因此从时代剧变伴随的心理动荡来看，应该说你说的这种感受是正常的，可理解的。其实我自己也能感觉到现在的年轻人相比从前考虑问题要复杂许多。像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会考虑好好读书，但是现在的大学生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

**问：**我读廉思先生的《工蜂》，从中得出这么一种结论：许多青年学者的生存处境堪忧，在为稻粱谋的情况下有时候学术的原则和操守会被扭曲。面对青年学者的清贫处境，您对志于从事学术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呢？

**张：**我觉得这里最关键的还是看个人的志趣。要是想挣大钱或者获得权力与荣耀，那你确实不应该从事学术，如果你喜欢做那种上面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的工作，你如果喜欢那种有很多朋友出入各种酒场或者和客户打交道的工作，你就可以做别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向往一种相对来说有自主安排的生活，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活动，一种不那么世俗和功利的生活，那大学确实是很好的去处。

当然我不是说大学里的人就不功利了，但是相对别的领域来说，大学的生活确实是更加崇尚知识和文化，因而少了一点功利之气。因为在大学里面你要经常和学生接触，而学生相对来说是最远离世俗的群体，因为他们还在朝气蓬勃地成长，还在不断学习，还没有受到过多的世俗污染。

所以，做学术有做学术的好，也能收获别的职业可能收获不到的东西。这就看你要什么了。从挑战性上来说很多职业都有挑战性，但是你真正内心的乐趣在什么地方你是骗不了自己的。

**问：**您是大概什么时候确定了自己政治社会学的方向的？当初为什么会为政治社会学产生兴趣？

**张：**产生一种兴趣的原因当然是非常多元的了。我自己认为对政治社会学的兴趣是出于自身的选择。因为我选择政治社会学方向是比较晚的博士阶段，在那之前只能说自己是社会学，但是还没有确立这么明确。

我到了读博士的时候，基于之前的阅读兴趣，我越来越能够认清自己的兴

趣在何处。我当时的阅读兴趣，甚至可以说延续到现在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三大块，一个是制度结构，一个是经济分析，一个是历史著作。这三个方面的著作我都很喜欢，读了很多。

后来我就发现，古今中外几乎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控制权的问题，不管是政治的控制权还是经济的控制权。我认为控制权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研究这个问题的就是政治社会学了。当时我的导师告诉我，世界社会学领域，最顶尖的学者都是集中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我当初吓出一身汗，我不知道他是在提醒我这个领域要想再做出新东西非常困难，还是在表达对我的一种期待和鼓励。我的导师让我自己去想。

总之，出于对我认为的最重要的问题的兴趣，我才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但是一个问题重要不重要不是看别人怎么说的，还要听从自己内心召唤。一个问题再重要，你对它不感兴趣，你也不可能做得很好。比如，我就招过一个研究生，一个女生，她跟着我读政治社会学，可是我经过和她多次交流就发现她不适合读政治社会学。因为政治社会学毕竟是一个比较偏结构化的、宏观的领域，对于科学思维和思辨能力的要求很

高，倾向于人文思维的人可能不会对它真正感兴趣的。

自己适合哪个领域，自己大概是最清楚的。我当初南开毕业的时候，南开准备留我在他们那边研究家庭社会学方向，但是我并没有答应，就是因为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问：**那您认为青年学生需要比较早地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一直坚持下去吗？

**张：**我觉得没有必要太急确定方向。实际上可以有多种的兴趣，对某个方面特别感兴趣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读很多那个方面的东西，读的多了自然就会更加擅长。我认为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问：**有人认为您的文章富于批判性，您认同这种评论吗？

**张：**如果有人认为我的文章富于批判性，我认为那是对我的一个褒奖。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是空洞而没有针对性的。一篇有冲击力的论文，一般需要一个着力点，需要一个它所针对的目标或者靶子。

**问：**那您觉得这种批判性和北大社会学系的氛围或者北大的某种传统有关系吗？

**张：**应该是有关系的。比如前段时间有个硕士生论文答辩，文章虽然还算

不错，但由于他/她最后的论调太过平和，有点像写政府表扬稿的意思，所以当时那个答辩小组就对这篇论文猛批一通。你看，一个不具有批判性的学生有可能让老师们群起而攻之。当然，后来我在读书会的时候又跟那个同学谈了修改意见，建议她/他从另外一个思路入手再考虑一下那篇文章。

**问：**您的很多文章带有一个这样的特点，您往往会在文中涉及到一个或多个案例，然后用概念或者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您当初在写文章的时候，一般是理论在先找到经验事实佐证的呢，还是先碰到值得探究的经验事实，在试图解释经验事实的过程中发展出合适理论予以解释的呢？

**张：**这个问题实际上好多人都问过我，我在下个学期讲论文写作的课上也会讲到。实际上，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不管是经验事实还是理论框架，多是自己学习得来的；而对一个相对成熟的研究者而言，由于很多理论知识已经内化为自身思考的一部分，所以在看待世界万物的时候已经有一种不同的眼光了，这个时候理论和经验更多是交融在一起的，而很难有一个先后的区分。

当然这是对成熟的研究者而言的。如果是对于一个初学者，如果硬要让我



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的话，我宁愿学生写那种讲一个完整故事而没有理论解释的文章，而不愿看到那种全部是理论解释却和经验没有多少关系的文章。这是一个在能力不足时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如果有更高的追求，还是应该做那种理论和经验高度融合的研究，前面我也说过，这两者原本就是紧密相关

的，是我们的不当教育把它们分得太开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生徐海东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阿东的小午报

采访者：张龙

编辑：丁香的耳朵

## 史苑钩沉

### 陈平原：战火烽烟催不垮的中国大学

**导语：**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西南联大是如何诞生的？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历朝历代，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及学校；只有当战乱平息，统治者才有心思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教育。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实际效果而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转移，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抗战中中国大学之所以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乃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

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借助于报纸公告、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获得信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赶往长沙报到。1937年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上午九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校史上加了个括号“实在也无处可躲”。作者的本意是，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我则理解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就在这连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

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史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

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具体到某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学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度为例，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至于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三分之二。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而绝大多数大学的迁徙过程，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像西南联大那样暂住长沙，而后迁往昆明，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校址原在上海吴淞镇北，抗战八年间，辗转内迁六次：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李庄。而国立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的浙大，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



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正因此，浙大人对于贵州心存感激，南归之前，专门以校长竺可桢名义立碑纪念。

当然，抗战中内迁大学之立碑纪念，最著名的，还属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具体谈论的是西南联大，但碑文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归的欢欣与赞叹，属于全体内迁高校的师生。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唯一差可比拟的，是前苏联的诸多学校。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上万高年级学生、教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为了保护儿童，政府将靠近前线的幼儿园和小学撤退到后方；至于学校课堂“讲授的内容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设立了战时防御题目的讲授”。毫无疑问，高等院校与卫国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

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 147 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方。”而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后的第八天，一批苏联大学教授来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重建医学院，第二年便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苏联卫国战争中，与西南联大的遭遇最为接近的，莫过于莫斯科大学。“就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莫斯科大学）就有数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职工投笔从戎，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不久，又有物理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师生数百人上前线。整个战争期间有三千多人参加苏联红军，许多人牺牲在战场。而留在学校里的专家，则“彻底修订了科研工作计划，把一些有关和平建设的课题取消了，而把具有国防意义的课题放在首位”。具体的迁徙行程是：1941 年 10 月开始，大部分师生迁到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12 月 1 日复课；1942 年夏季，战局不利，又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随着苏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1943 年春，莫大胜利回迁莫斯科。换句话说，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

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批的大学生（更不要说教授）入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面对各方激烈争议，教育部不为所动，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第一次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一个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则他们应如何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

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们，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 834 人，牺牲 5 人。实际上，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但总的来说，并非绝大牺牲。

抗日战争中，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是西南联大。可后人谈论“大学精神”，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都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作为史家，我承认此例证很有说服力；但同时我更想强调，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

“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这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而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我曾不止一次推荐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中的一幅照片：1940 年 10 月 22 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

图书。我说：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后来，我终于找到一幅可与之媲美老照片，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体时间及地点，以便将其作为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我提及这幅照片：“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

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来源：《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作者：陈平原

编辑：丁香的花朵



# 大美北大

燕园 雪晴











摄影：董彦（文中照片均摄于北大校内）



## 学员心声

### 读书是福——参加北大军转培训第一周体会

实话讲，从签卡那一刻起，我就在盼望着在北大的培训了，这也是我忍痛放弃市属院校选择现在单位的原因之一。

读书是福，到北大读书尤其如此。高考前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是北大，我曾在家里书桌正对的窗台上用粉笔写了“北大不是梦”五个字（上次回家发现这几个字竟然还在）。但后来残酷的事实证明，北大真的成了一个梦。

08年来单位报到以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北大，记得当时已是暑假，校园里有很多外地赶来参观校园的莘莘学子。在未名湖边上，我碰到了一个签名售书的残疾作家，他的名字我倒是忘了，但我记得我买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热爱》。后来单位分公寓房，恰巧我们对门和楼上的邻居都是北大毕业的，我们几家的关系也都处的很好。

转业后才知道考试是在北大，其实在这之前我也经常进去的，尤其是每年学生毕业时节，我会去北大清华

校内的跳蚤市场上淘几本自己喜欢的书（买了一些，但看的不多）。我们经常一起复习备考的小组里也有一个转友是北大毕业的。而我现在单位的顶头上司也是北大高才生。自己也曾想有机会去北大再提高一下学历。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自己很珍惜来北大学习的这四个星期，相信很多转友也和我一样。对于个别转友的培训无用论，我是不赞同的。必须承认，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实用主义盛行。人们来去匆匆，为生计而奔波，为名利而忙碌。没用的事我们不做，没用的朋友我们不交，没用的书我们不看。我们在各种期待中匆忙的做着自认为有用的事。

但是，所谓的“有用”又是个什么概念？回想咱们能通过军转考试顺利进入中直单位，之前做的什么事是“有用”的？什么又是“无用”的？跟当初认为的一样吗？不知大家感觉如何，回首往事才发现，凡是自己印象深刻感觉自豪的事都是“没用”的

事；凡是相处比较融洽，无所拘束的朋友都是“没用”的朋友；凡是让我陶醉的书刊，都是“没用”的书刊。既然圣人说过“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而且还能流传到今天，自然有他的道理。“无用”之用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去体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眼光再放远一点，把心态再放平一点，把期望值再放低一点。

“底线比境界更重要”培训课上王司长的这句话是这一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王司长是在讲最后一点“廉洁自律、一生平安”是讲的这句话。

回想一周来的课里，周旺生教授的法制课，宋磊教授的公共政策课，于洪波教授的项目管理课，睢国余教授的宏观经济课，以及张建秘书长的机关工作注意事项，都多多少少涉及到了底线问题。

“坚持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习大大的这句话，已被众人所熟知。底线思维是世人总结的习大大几大惯用思维之一。

我们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都是要有底线的。底线是我们心中不可逾越

的警戒线，一旦突破底线，就会出现我们无法接受的坏结果。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底线思维，结合自身，划出自己心中的底线，守住底线，不越边界，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唯有如此，才能不留遗憾，唯有如此，才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回归家庭、享受生活”是很多转友包括自己的转业最大动机之一。能顺利转业到中直单位对很多转友也是不容易的。现在，幸福生活已向我们走来。但是，我们也不能放任自流，以防乐极生悲。以前我们是生活在条令条例的约束之下，强调“令行禁止”，甚至是领导大于天。现在习大大推行全面依法治国。法律对百姓则是“非禁即入”，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一方面，我们要挣脱原来条令条例过多的束缚，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法律意识。法律是最后的红线，执行起来不跟条令条例一样可以随便打折扣。总之，心里要绷紧底线这根弦，要守住我们顺利上岸这一关键阵地，更要守住以后长久的幸福生活。

作者：中国财经报社新媒体部

刘彬